

解码重庆“电影基因”——

500多部影片为何在这座“魔幻之城”取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实习生 姚多米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立体魔幻，这是重庆自带的“电影滤镜”。凭借着独特的魅力和个性，重庆早已成为全球电影人的灵感源泉。近10年间，500多部佳作，如《坚如磐石》《少年的你》《刺杀小说家》在此取景，让洪崖洞的璀璨灯火、李子坝轨道穿楼、黄桷坪涂鸭街一次次惊艳银幕。

7月3日，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将在重庆永川拉开帷幕。这座山水之城与电影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为何电影节“花落”重庆永川？记者深入探访发现，重庆的吸引力远不止网红景观——从地质奇观到市井肌理，从历史纵深到未来想象，这座城市的每个褶皱都藏着令电影人痴迷的叙事密码。

光影百年 重庆与电影的不解之缘

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而中国人自己拍电影，到今年也正好120个年头。120年来，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经典影片。而重庆，是提到许多优秀影片时，绕不开的地方。

1938年，随着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央电影制片厂等纷纷内迁重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战时电影制作中心，《东亚之光》《火的洗礼》等抗战电影在此诞生。其中，在重庆拍摄的故事片《中华儿女》还曾获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是中国最早获国际荣誉的电影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抗战期间，重庆的各大电影机构就拍摄了200多部各类影片，这些影片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也为中国电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

■刘乃歌

2025年6月，《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公开放映，激发了中美观众深层共鸣。

这部尘封80年的影像作品，在重庆的有序推动下得以成功修复并实现对外展映，重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的真实图景，也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穿透力与情感张力。

历史影像的“再激活”与跨文化共鸣的可能性

与以往不同，这场放映并非单纯的纪念仪式，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播事件。

影片由中国团队历时数月修复，以数字化、高清方式重现80余年前的历史真实，并在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中激发了超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重庆国际文化交流协会、西部国际传播中心、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等单位主办，通过高度专业化与情感化的传播部署，使这场影像回归不仅具备技术完成度，更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理解力与国际对话能力。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我将此次放映与其所激发的多维回响，视作中国影像记忆在全球语境中“再语境化”的典型个案，其深层意义不仅在于“重现过去”，更在于“唤醒未来”——唤醒我们对文化记忆建构方式的反思，对国家形象表达路径的更新，对“非对抗性传播”可能性的重新认知。

作为一部拍摄于1937至1940年间、由美籍摄影师雷伊·斯科特与华裔女性艺术家李灵爱共同完成的纪实影像，《苦干》所呈现的是抗战时期中国西南大后方的真实图景，其历史价值毋庸置疑，曾获1942年奥斯卡特别奖。引人关注的是，这段曾一度被遗忘的影像如何在当下国际传播现场获得“再激活”？换言之，当一段历史影像穿越时空，再度在异国他乡的银幕上被观看、被感动、被理解，它所经历的绝非简单的“复制”或“转述”，而是一种嵌套于媒介技术、文化政治与情感认同之中的多重建构。

《苦干》的数字修复并非简单的“复制”，它是一场在文化记忆系统中进行的深度再生产。借助人工与AI技术协同修复，这部珍贵的胶片影像不仅恢复了画面和声音，更重建了历史的现场感与经验强度。在修复技术的帮助下，影像重新获得观看的“现在性”，从而引发了受众的跨文化共鸣。

更为重要的是，《苦干》的传播并未依赖宏大的国家话语，而是通过历史亲历者后代的深情讲述、地方文化机构的精细安排、华裔导演的艺术参与、以及普通观众的情感回应，构成了一种由“多主体参与”实现的“非对抗性传播”范式。

在这场传播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影像作为“情感中介”，如何在全球多元社会中建立共鸣通道。这正是萨拉·艾哈迈德所言“情感作为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人们不是仅仅“接收信息”，而是在“被触动中生成意义”。

影像作为文化记忆的“第二文本”：从纪实影像到跨文化传播的符号转换

在当代媒介文化研究中，历史影像已不仅是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曾在重庆多地取景。图为该电影在渝中区解放碑拍摄的镜头。（电影画面截图）

无二的“大后方电影”时代。

南岸区文物保护单位——黄家巷公馆建筑群，就是中央电影摄影场曾经的办公和拍摄地。尽管摄影场早已撤离，但电影在重庆的痕迹没有消失，光影在这里的每一块白瓦青砖上打上了烙印，为这座山水迷雾之城增添了一份电影质感。

进入21世纪，重庆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历史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大银幕上。2002年，巩俐主演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中，长江索道轿厢缓缓到站，乘客们就在这里穿过长江到达彼岸；2006年，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以重庆为背景，演员黄渤在苏家坝立交一路狂奔的镜头成为经典。此后，《火锅英雄》里的防空洞火锅、《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的鹅岭天台、《少年的你》里的魁星楼与皇冠大扶梯……重庆的立体空间、市井烟火、赛博朋克气质，都是受电影人青睐的“天然片场”。

原始事件的机械记录，它更是一种可被重新编码的“第二文本”。这一概念强调，影像在离开其生产语境后，往往会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被“再解读”“再叙事”，并产生新的社会意义。

《苦干》正是这样一部具有高度可变性与文化流动性的历史文本。它不仅是抗战中国的视觉记录，也是全球记忆体系中一种不断生成与流转的文化资源。

在此次放映活动中，重庆市委宣传部门与多家文化单位，共同推进《苦干》的跨文化传播与学术转化，不仅保障了展映的制度支持，更体现了地方文化传播实践对国家叙事的前沿回应。与其说是一次“电影放映”，不如说是一次文化记忆的策展实践——它以地方为轴心，以历史为媒介，激活了中美观众之间的情感通感与记忆回声。

玛丽安娜·赫希在“代际记忆”理论中所指出的：第二代或“旁观者”对历史事件的情感联结，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而是通过影像、讲述和物质文化等“媒介痕迹”间接传承。而《苦干》展现的，恰是这样一种被历史遮蔽的经验如何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重新获得观看主体。比如片中对重庆大轰炸的彩色影像，不仅具有档案意义，更以视觉震撼构成了观众的情感入口。正是在这种震撼中，记忆不再是知识性的复述，而是成为感官性的再体验。

此外，《苦干》在1942年曾获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但其影片长期湮没，仅在小范围内传播。此次修复与公开开放，不仅是对影像文本的技术“修旧如旧”，更是一种文化维度上的“记忆政治”实践。

安德烈亚斯·胡伊森指出，现代社会并非遗忘，而是“记忆泛滥”，其中，国家与机构需要主动选择哪些影像应被“保留”“修复”“传播”，哪些应被“沉默”或“淡化”。从这一角度来看，重庆方面推动《苦干》的再发现与海外展映，是一种主动塑造文化记忆、重写国际传播叙事结构的举措。

在此次活动中，美国观众的情感回应也进一步验证了《苦干》的跨文化传播价值。

美西华人学会会长刘荣文表示：“影片修复得令人震撼，仿佛历史重新站在我们面前。”现场观众伊丽莎白动情地说：“从未想过一部80多年前的影片还能如此清晰、生动，太难以置信了。”另一位观众安德鲁则指出：“视觉冲击远比文字档案更为直观有力。”这说明，影像所生成的不只是“历史知识”，更是“历史感”。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正是图像在全球语境中建构“集体记忆”的核心机制之一。

从“纪实文本”到“文化符号”，《苦干》的身份已悄然转变。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战争、牺牲与坚韧的民族故事，也成为中美之间一种以情感共鸣为基础的文化对话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重庆的角色不再仅是影像的生产地，而成为历史与当下、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记忆中枢。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以民间情感为通道、以国际文化平台为节点的传播范式，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提

硬核实力 打造电影工业新地标

如果说重庆的城市风貌是吸引剧组的外在因素，那么永川科技片场、两江影视城等产业配套，则是让重庆成为“剧组刚需”的核心竞争力。

永川科技片场总建筑面积8.4万平方米，已建成2期。这里拥有亚洲顶尖LED虚拟拍摄系统，提供多元顶尖生产环境。相比传统摄影棚，永川科技片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平均可为剧组提升40%拍摄效率，虚拟拍摄棚使用率超90%，拍摄档期已经排到2026年第一季度。

在这里，无论是广袤无垠的沙漠还是夕阳西下的小桥流水，都能经由一块块电子屏幕变成生动的图像。这些实时渲染输出的高品质画面，让剧组“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成为可能。此前在第78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狂野时代》，就

供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操作模型。

跨文化传播中的“再语境化”机制：媒介、情感与理解的协同建构

在全球语境中进行历史影像传播，往往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如何让“他者的历史”被“当下的观众”真正理解，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这并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编码与接受结构的问题。《苦干》的成功放映恰恰提供了一个范例：在数字化、机构协作与情感引导的共同作用下，一部中国抗战纪录片完成了从历史文献向跨文化交流事件的转化，其内在机制可被归纳为一个深度的“再语境化”过程。

所谓“再语境化”，是指文本脱离原有历史语境后，在新的文化场域中被重新置入、重新理解的过程。就《苦干》而言，其原始语境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战争与动员，而其重生的语境则是21世纪中美之间的公共文化交流。在每一次“语境迁移”中，媒介技术、叙事框架与接受结构共同作用，使影片产生了超出原意的传播能量。

首先，数字修复技术的介入并非只是物理性的“修补”，而是一种“观看方式的更新”。在AI插帧、智能降噪等技术支持下，原始胶片所承载的历史印记被赋予了高清晰度与强临场感，使原本遥远的历史事件以近乎“在场”的方式重返观众视野。在此语境下，技术不是历史的干扰，而是文化记忆激活的触媒。

其次，叙事方式的再组织也极为关键。不同于战争宣传片常见的单一视角，《苦干》展现出一种“温情中的力量”，即以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为主体——挑夫、母亲、学生、游击队员——将抗战精神具体化、人性化。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受众对战争题材影片“悲情化”或“意识形态化”的预期，反而以“个体视角的真实”建立起信任感。许多观众在观影后表示，他们“第一次如此具体地看见那个时代的中国”，这正是斯图亚特·霍尔所强调的“表征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典型实践：意义的建构，不仅靠说什么，更靠怎样呈现。

再次，不可忽视的是情感作为文化传播中最具穿透力的媒介。在奥斯卡博物馆的展映现场，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观众对影片中重庆市民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片段反应尤为强烈。有观众泪流满面，有人起立鼓掌，还有许多观众围住斯科特的后代表达敬意。传播的有效性，正在于这种“非语言的共振”。在《苦干》的跨文化传播中，情感成为打通语言、身份、记忆障碍的关键通道，它让“历史的他者”变得“可以被感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播过程是由地方政府——重庆市委宣传部及其协作机构发起、组织并参与其中。通过重庆代表团成员与美国民间社会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家属代表、学者、导演等多元身份的融合参与，《苦干》的传播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事件，其影响力超越了一

将永川科技片场作为主要拍摄地。

“永川科技片场没有实景搭建，而是一整套的工业化体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永川科技片场运营商达瓦科技董事长卢琪表示，《狂野时代》这样的大体量项目选择永川，是因为这里具备了承接大制作的能力，同时能够联合上下游企业为其提供完善的服务。目前，达瓦科技已经带动了超过150家产业上中下游的制作公司。

两江国际影视城，则是一处宛如时光隧道般的存在。它以巴渝文化为底蕴，通过仿古建筑，将人们带回到那个风云变幻却又充满独特魅力的时期，《一九四二》《开罗宣言》等历史题材影片均在此拍摄。

此外，重庆还有许多特色影视基地。如，江津白沙影视基地，是众多年代剧的拍摄首选地；大渡口四号仓库影视基地集摄影棚、道具器材库、录音制作棚于一体，可为剧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武隆天生三桥影视基地，武陵风光之秀，引得《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4》等电影先后来此取景。

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帆认为，重庆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电影人提供了影像叙事的无限可能，尤其是以永川科技片场等影视基地为代表的电影工业新地标，为重庆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甚至让人看到通过科技力量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刘帆期待，借着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这样的国际化平台，重庆本土电影人能够得到更多滋养，从而让重庆搭台、中国唱戏乃至世界唱戏形成闭环。

产业崛起 构建电影全产业链生态

重庆电影产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其独特的拍摄场景和硬核的片场设施，还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大力引导。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比如，修订完善包括影视在内的重大文艺精品奖励实施办法、重大文艺精品项目创作生产资助办法，健全影视精品创作全周期质量管理机制。同时，建立影视拍摄一

次简单的放映，延伸为一次中美民间记忆的联结、一种全球观众共同参与的视觉仪式。

归根结底，真正的跨文化传播从不依赖强制灌输或灿烂包装，而是建立在“理解才有可能”的基础之上。而《苦干》的洛杉矶展映告诉我们，当媒介技术得当、叙事策略精准、情感路径真诚，即便是80年前的胶片影像，也能成为今日世界之间最柔软却最有力的文化桥梁。

文化认同的重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从影像传播到精神叙事

在全球传播格局不断裂变重组的当下，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早已超越“传递信息”的初级功能，它越来越成为建构国家形象与重塑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传播场域中，影像不仅记录过去，更承担起重新诠释“我们是谁”的叙事使命。

此次《苦干》的跨国传播正展现了这一文化机制的复杂性。它不是一部“新创”的主旋律影像，而是一部“再发现”的历史作品；它不是“对外宣传”的产物，而是在当下被赋予新意义的文化遗产。在这种“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介于历史与现在之间”的特殊属性中，《苦干》所唤起的，不仅是观众对中国抗战精神的认知，更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层文化记忆与人文价值的国家的重新认识。

重庆市委宣传部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策划与引导作用。他们不是单纯地“组织一次活动”，而是以一种面向全球的文化思维，联动电影资料馆、抗战研究机构与地方文化传播组织，将一部尘封影像整合为一个可传播、可共鸣的国际叙事。他们不仅重视技术层面的修复，更着眼于文化表达的温度与共情点，把《苦干》从一段“被发现的记忆”，转化为一项“可以激活的传播资产”。这一操作显示出地方宣传系统正在由“叙述主体”逐步演进为“记忆平台”与“国际文化策展人”。

《苦干》的重映，不仅塑造了一个充满韧性与尊严的抗战中国形象，更展示了当代中国在处理历史、记忆与传播之间的理性、温和、开放而富有诚意的人文态度。

此外，《苦干》这一传播事件的成功，也说明国家形象建构并不总需要宏大叙事与全媒体矩阵的高压推进，相反，有温度、有细节、有历史质感的微叙事往往更容易穿透文化边界，打动他者。《苦干》中那些没有被配音的重庆母亲、游击队员与挑夫，他们沉默的目光、奔跑的身影、废墟上的笑容，是国家认同最真实也最可信的映照。

在这一语境中，“国家形象”不再是政治标签的输出，而是一种经由人文路径自然生成的认知结构。重庆作为影片的重要发生地、修复工作的主导者与传播行动的组织者，也从一个“抗战地理”的历史意象中升格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代表符号。地方的文化能动性，成为文化

站式服务平台、推进电影“扶奭计划”、上线“文化·光影重庆”应用等。

在政策的扶持下，重庆电影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重庆市电影制片行业协会汇聚了达瓦科技等一批电影行业领军企业，协会理事长裴云纲介绍，由协会运营的影视拍摄一站式服务平台，近6年累计服务《坚如磐石》等剧组500多个，协调拍摄场地近5000处。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渝派影视作品“上桌”，如重庆主投主创的电影《开山人》入围第二十届华表奖“最佳农村题材影片”提名名单。

此外，重庆还积极举办各类电影活动，提升城市的电影氛围和影响力。除了即将举行的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2024年，重庆还举办了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成为国内首个聚焦“电影科技”的专业活动。而本土成长起来的重庆青年电影展已经举办到第12届，无数青年创作者从这里启航追梦、圆梦。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为电影人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重庆电影产业的发展。

“花落”永川 电影节的“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为什么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花落”重庆永川？“科技”是本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一大特色，而“科技”也是永川培育壮大电影产业的一大亮点。”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上，永川区委书记关衷效这样回答。

事实上，这背后，更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择。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科技光影·上合风采”，开幕式都将在永川科技片场2期5000平方米的虚拟摄影棚进行，无论舞台制作数控技术运用的数量还是难度，都堪称电影盛典之最。电影节执行团队——电影频道导演团队，在挑选场地时特别选中了永川科技片场，并且导演组认为，只有在永川科技片场才能够实现这一现实与虚拟交融的视觉盛宴。

同时，近年来，永川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科技影视产业，进一步补齐了影视产业链条，推动“拍重庆”向“重庆拍”转变，“传统摄制”向“数智赋能”蝶变。此外，永川还利用西部职教基地的优势，打造产城职创一体化影视人才联盟，在培养影视人才5000余人、能够输送虚拟拍摄、人工智能视效制作、影视数字资产生成、美术动画、影视器材操作等应用型人才。

从抗战烽火中的胶片坚守，到虚拟拍摄时代的科技领跑，重庆与电影的缘分早已超越简单的“取景地”关系。当上合组织国家的电影人齐聚永川，我们期待着更多“重庆造”电影在世界绽放异彩。

外交的桥梁。

总之，《苦干》所展现的国家形象建设，超越了传统“外宣”的概念，它体现了一种“情感引导+文化传承+技术叙事”三位一体的文化传播新机制。在这个机制中，重庆市委宣传部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全球文化对话的组织者与记忆政治的协调者。这一经验无疑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让历史说话，让影像共情，用一部片子讲清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

文化传播与未来记忆的中国路径

《苦干》在奥斯卡电影博物馆的重映，不仅是一部影像的归来，更是一次关于文化传播与记忆建构的深刻启示。在当前全球化愈加复杂、文化身份认同频繁变动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有效开展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建设国家形象，已成为文化战略层面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而《苦干》所引发的跨文化情感共鸣与全球观众的积极回应，提供了一条超越“传统外宣”、深入文化深层结构的传播路径：以历史影像为媒介，以人文关怀为内核，以地方行动为支点，构建具有全球穿透力的记忆叙事。

这部影像的“复活”并非偶然，而是多重条件叠加下的结果：数字修复技术的进步、机构之间的高效联动、传播策略的精准执行，以及最重要的——文化主体意识的转变。从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导的策划与统筹到修复团队的技术攻坚，从影片主创后代的真情致辞到观众的深情回应，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传播从“内容输出”转向“意义共建”的根本转变。

当代中国传播研究需要正视这样的现实语境：在面对全球公众时，文化传播不是压倒性的说服力，而是细水长流的理解力；不是灌输式的灿烂言说，而是共情式的真实抵达。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讲好中国故事”并不等同于讲述一个标准的“成功模板”，而更应该是对中国历史、社会与个体命运复杂性的温柔展现。在《苦干》中，重庆市民的坚韧、普通人的抗争、跨文化友谊的缔结，这些原本属于战时历史的片段，却因数字技术的介入与传播逻辑的更新，被转译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语法”。它所构建的，是一种“以记忆为中介的文化传播”，一种可被不断扩展的“中国路径”。

这种路径的核心，是要在“文化自信”与“文化敏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自信于中华文化深厚的精神资源与历史逻辑，也要敏感于全球受众的文化感受与媒介习惯。未来的中国国际传播，应更多依赖像《苦干》这样具有人文温度、技术含量与历史厚度的“叙事共同体”，在非对抗性、跨文化的传播空间中建立持久的理解与信任。

历史并未终结，记忆仍在生成。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声音叠加”，而是更深的“意义穿透”。《苦干》以其静默的影像语言告诉我们：最有力量的传播，不一定是最响亮的，而往往是最真实的；最动人的形象，不一定来自权威宣告，而往往源自人民自身。这一点，重庆做到了。

未来，当我们再次谈论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不妨记住《苦干》的那一刻：当历史在光影中被点亮，当观众在黑暗中静静流泪，当掌声在奥斯卡博物馆久久不息，中国的文化传播，正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